



江西六朝墓葬综述*



韦正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一. 发现概况

据笔者所知,今江西省境内已经发掘公布材料的六朝墓葬材料有180余座,约占六朝墓葬总数的十分之一不足。墓葬数量虽然不及六朝曾定都于其境内的江苏省和湖北省,但与其他省份相比并不逊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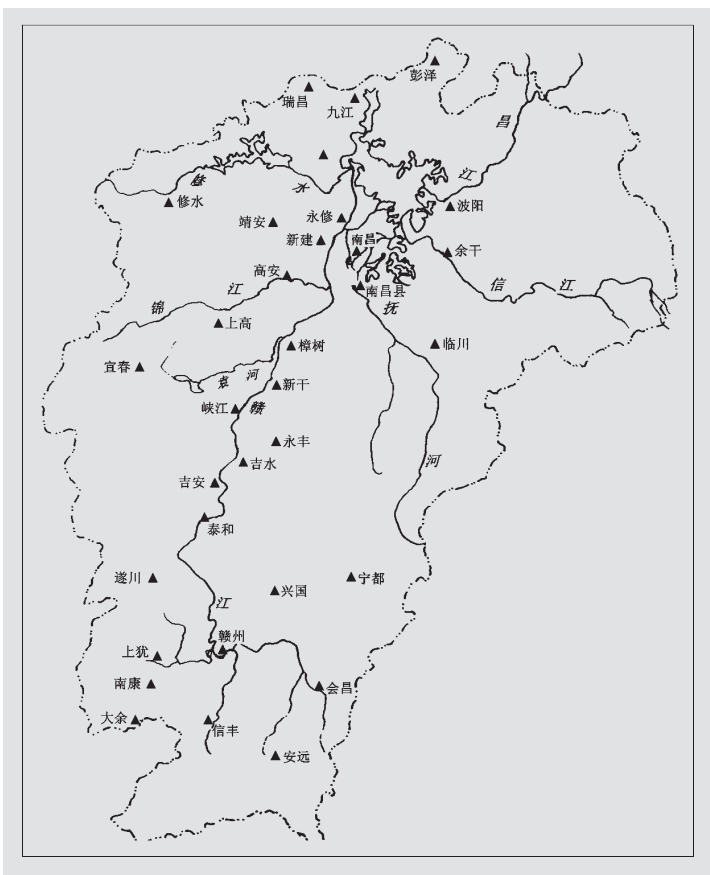
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江西地区六朝墓葬的考古发现一直不曾中断,为便于读者检核补充,下面按照时间顺序罗列各项发现,如表一。

从墓葬时代看,六朝各个时期的墓葬都有发现,数量也比较平均,不似有些地区只集中在某一阶段,这是江西地区六朝时期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反映。

从地域分布状况看,这些六朝墓葬集中分布在冲积平原和河谷地带,最为集中的地域是赣江下游

南昌、清江(今樟树)至中游的吉水、吉安一线,在赣江支流袁水流域的宜春、新余,锦江流域的高安、上高,潦河流域的靖安,修水流域的永修等地也有较多的发现。赣江上游的赣州、大余、于都、信丰、会昌等地也有一些发现。江西省东部只在昌江流域的波阳、信江流域的余干、抚河流域的抚州等地有零星发现,

与西部和南部地区形成明显的反差,虽然不排除墓葬发现的偶然性因素,但这个情况仍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六朝时期江西东部地区远不及西部地区发达。江西省北部沿长江一线九江、瑞昌、彭泽等地也有一些六朝墓葬(图一)。不同时期墓葬分布的地域状况略有差异,赣江中下游地区的墓葬分布状况一直比较稳定,北部沿长江地带发现了若干东吴西晋的墓葬,南部的赣江上游地带发现了若干南朝时期墓葬,南北似乎呈现出此消彼长的现象,一定程度上



图一 江西地区六朝墓葬分布示意图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重大项目“河西魏晋十六国墓葬研究——以敦煌佛爷庙湾出土资料为中心(项目批准号08JJD78011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又,为保持本文的完整性,文中将曾发表于韩国考古学探究会编《考古学探究》第2号(2007)中的《中国江西地域六朝墓葬》中的部分内容加以修改后收入本文。

表一 江西六朝墓葬发现一览表

年代	年份	地点	时代	数量	出处	年代	年份	地点	时代	数量	出处
20世纪50年代	1957年之前	南昌市郊、遂川县天子地	六朝	18	考古学报 57, 1	20世纪80年代	1982	上高潘家村	南朝	3	江西历史文物 83, 4
	1959年	修水董家坳	南朝	1	考古 59, 1		1982	清江经楼	南朝	1	文物 87, 4
50世纪60年代	1959至1960	清江太姑山、店丘下	吴晋	19	考古 62, 4		1982	峡江巴丘	西晋	1	江西历史文物 86, 2
		清江潭埠	南朝	11	考古 62, 4		1982	九江蔡家洼	晋末南朝	1	江西文物 90, 1
	1960-1961	南昌市京山、罗家集	东晋南朝	4	考古 62, 4		1982	大余宝珠山	南朝	1	江西历史文物 84, 2
	1962	永丰蟠龙山	南朝	1	文物 64, 1		1982	九江汤桥小学	东晋	1	江西历史文物 84, 1
20世纪70年代	1964	南昌市徐家坊	吴晋	1	考古 65, 9		1982	余干长冈山	南朝	1	江西历史文物 83, 1
	1964	新干金鸡岭	东晋南朝	14	考古 66, 2		1983年前	南昌市叠山路、都司前	汉末东吴	6	考古 83, 10
	1964	清江洋湖	东晋南朝	11	文物 65, 4		1983	清江山前	东吴	3	江西历史文物 86, 2
	1964	南昌市郊	东吴	1	考古 65, 5		1983	于都长征小学	东吴	1	江西历史文物 85, 1
	1965	抚州镇南郊	东晋	1	考古 66, 11		1983	高安梳头山	南朝	1	考古 85, 9
	1971	宁都塘泥排	南朝	1	文物 73, 11		1984	大余宝珠山	南朝	1	考古 87, 4
	1972	瑞昌马头	西晋	1	考古 74, 1		1984	安远老围村	南朝	1	考古 86, 8
20世纪80年代	1973	南昌市郊	汉末东吴	1	考古 78, 3		1984	南昌市青云谱岱山	两晋	3	考古 86, 9
	1974	信丰小甲背	两晋之际	3	江西历史文物 84, 2		1985	靖安虎山	西晋南朝	3	考古 87, 6 或江西历史文物 85, 2
	1974	南昌市永外正街、老福山	东晋	2	考古 74, 6		1986	彭泽旧县塔下	东吴西晋	1	江西历史文物 86, 2
	1976	南昌市绳金塔、京家山	西晋	2	考古 81, 6		1986	泰和上田码头	南朝	1	江西历史文物 87, 2
	1979	清江山前	南朝	17	文物资料丛刊 8 或江西历史文物 81, 1		1987	南昌张家山	南朝	2	南方文物 92, 2
	1979	大余二塘	南朝	3	或江西历史文物 80, 3		1988	赣县白鹭	南朝	1	考古 94, 7
	1979	永修红旗生产队	南朝	1	考古 84, 1 或江西历史文物 81, 1		1988	赣县上高村	南朝	1	江西文物 89, 1
	1979	南昌市儿童医院	东吴西晋	2	江西历史文物 80, 3		1989	会昌南星村	东晋?	1	考古 93, 12
	1979	南昌县小兰乡	东吴	1	考古 93, 1	20世纪90年代	1991	九江陶渊明纪念馆	晋末南朝	1	南方文物 97, 1
	1979	南昌市阳明路	东吴	1	考古 80, 3		1991	吉水城郊	汉末吴早	1	文物 01, 2
20世纪90年代	1980	赣县白鹭公社	南朝	1	考古 84, 4		1994	吉水富滩	东吴西晋	1	南方文物 96, 3
	1980	九江干部修养所	东晋	2	江西历史文物 81, 4		1997	南昌市火车站	东晋	6	文物 01, 2
	1980	九江黄土岭	两晋	2	考古 86, 8		1998	南康横寨	南朝	1	考古 05, 10
	1980	靖安野鸡园	东晋	1	江西历史文物 81, 4	21世纪	2000	瑞昌朱湖	西晋南朝	6	南方文物 03, 3
	1981	新干酒厂	两晋之际	1	考古 83, 12		2006	南昌市火车站	东晋	1	2006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1981-1982	兴国永丰公社	东晋南朝	4	江西历史文物 84, 2		2007	南昌市梅湖	东晋	1	文物 08, 12

反映了江西地区对外交流状况的变迁。

二. 分期

根据对墓葬形制和随葬陶瓷器的综合考虑,可以将今江西地区的六朝墓葬分为四期:汉末东吴早

期、东吴后期—东晋早期、东晋中后期、南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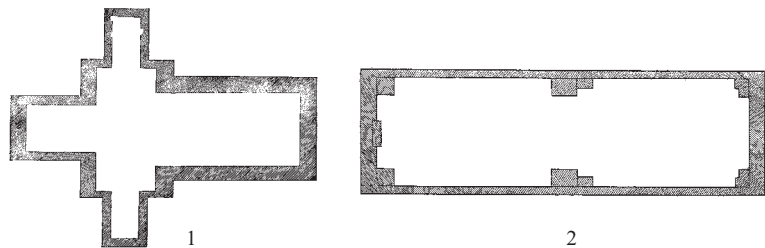
第一期即汉末东吴早期的墓葬的确定有一定的难度,所以需要略微详细地加以说明。墓葬数量不多,有南昌叠山路墓 M2、南昌小兰乡墓、南昌高荣墓(图二、1)、吉水城郊 2 号墓、南昌徐家坊墓(图二、2)

等。几座墓葬的形制都不一样,叠山路墓是带小龕的凸字形,小兰乡墓是十字形,十字的中间部分还砌成叠涩顶,高荣墓是非常对称的前室带耳室的前后室墓,吉水城郊2号墓与徐家坊墓总体上接近,都为长方形的前后室墓,吉水城郊2号墓墓室的后壁有三个砖柱,徐家坊墓则在墓室的前中后部都有砖柱,应该说后四座墓葬还保存一定的东汉遗风。推测几座

为蟹壳青)。当然,高荣墓的墓葬形制也有很强的时代性,这种墓葬形制虽然有东汉遗风,但是仅就此墓葬形制而言,在湖北鄂城地区发现了好几座,都是时代明确的东吴墓葬,高荣墓应该是受到湖北地区影响的产物,其时代也当在东吴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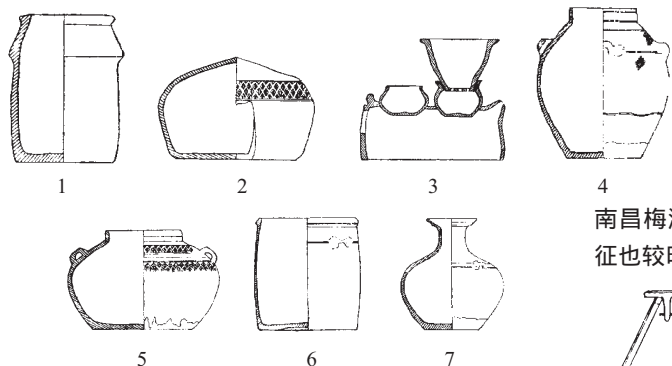
叠山路2号墓出土的陶瓷器有陶罐、青瓷壶、罐、钵、酱釉四系罐。小兰乡墓的陶器有罐、壶、瓮、灶、仓、井,这些陶器有的施酱褐釉或粉白色的铅釉,胎釉结合多不好,瓷器有卵形罐、扁罐、钵、大平底罐,大平底罐的形制与东汉中原地区的“初平罐”有几分相似,釉色多为青绿色,多数结合良好,也有脱落者(图四)。南昌徐家坊墓陶瓷器的总体特征同前面几座,具有东汉时期特点的是高圈足陶壶和陶井。

第二期即东吴后期—东晋早期墓葬包括南昌绳金塔墓、信丰小甲背墓、新干酒厂、清江晋墓M2、南昌火车站M4、M5、吉水富滩墓、南昌梅湖墓、瑞昌马头墓等,墓葬数量较多,时代特征也较明显。在墓葬形制方面,形式仍然比较丰富,



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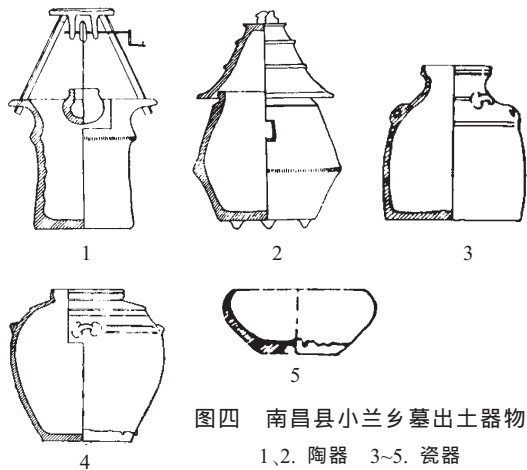
1. 南昌高荣墓 2. 南昌徐家坊墓



图三 南昌高荣墓出土器物

1~3. 陶器 4~7. 瓷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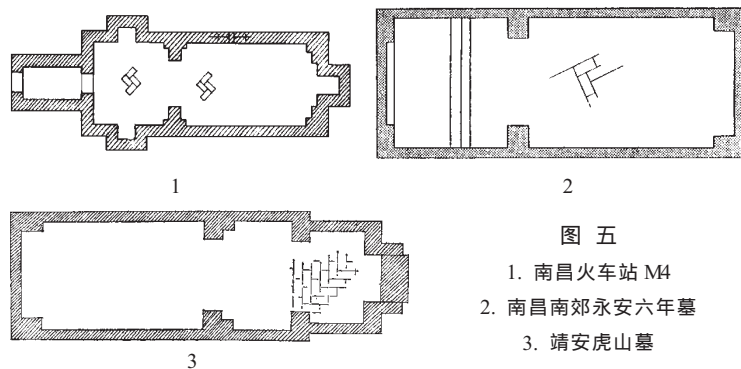
墓葬属于汉末东吴前期的主要根据是其中的出土物,叠山路墓M2定为汉末东吴早期的理由已在相关注释中予以说明了,此不赘述。其余三座墓葬定为汉末吴早期的主要理由虽然不像叠山路墓那样强烈,但断代依据主要还是随葬品,特别是陶瓷器兼具汉末、东吴时期的特征,其中高荣墓本身即是一座时代可靠的墓葬,墓葬出土的随葬品可以作为其他墓葬断代的标尺。可以确定高荣墓为东吴墓葬的直接理由至少有两,一是木刺中“沛国相”三字,简报考证沛国立于曹魏时期,存在时间为公元232~238年,高荣墓的年代当在此时或此后不久;另一理由是其中出土了“太平百钱”,现在普遍认为这是蜀国铸造的货币。随葬品中东汉特色的陶器有灶、罐、井、仓,又有与这些陶器形态很不相同的青瓷罐、盘口罐、子母口罐、卵形罐、直壁罐(类似两广地区的提筒)、钵(图三),瓷器的釉色分为豆青和酱色(或称



图四 南昌县小兰乡墓出土器物

1,2. 陶器 3~5. 瓷器

与上一阶段的关系明确。南昌火车站M4(图五、1)、M5上承高荣墓,但有所变形。南昌叠山路M4则是吕字形的墓。南昌南郊永安六年墓(图五、2)、清江晋墓M11上承吉水城郊2号墓,但砖柱的位置并不固定,大抵在墓室的四角或用作前后室的分割标志。靖安虎山墓(图五、3)是新出的一种类型,整体上为凸字形,相当于在南昌南郊永安六年墓、清江晋墓M11的前面加上一个甬道,可以算是普通凸字形墓与带



图五

1. 南昌火车站 M4
2. 南昌南郊永安六年墓
3. 靖安虎山墓

砖柱的长方形前后室墓葬的结合,砖柱很引人注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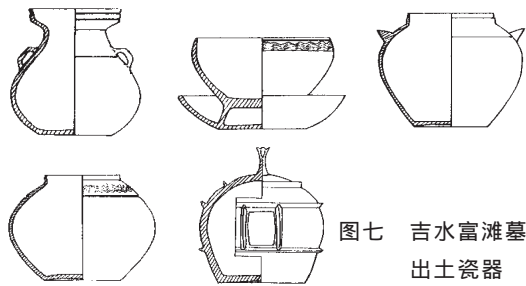
普通的凸字形墓和长方形墓葬也有。随葬品方面表明出明显的特色,东汉特色的陶器基本淘汰,带有东汉特色的酱釉陶器也似乎不见了,青釉瓷器成为主要的随葬品,器物的种类明显可分为两个类型,一类与长江中游地区的瓷器有密切关系,一类带有江西地方色彩。前一类瓷器如南昌京家山墓的青瓷



图六 南昌火车站雷錡墓出土瓷器

虎子、水注、三足盆,还有南昌火车站雷錡墓的虎子、盘口壶、曲腹钵

(图六),更多的则是后一类,如南昌绳金塔墓的四系高领球腹罐、清江晋墓 M11 球形仓、鸡笼、牲口圈、水井,吉水富滩墓除了有与清江晋墓 M11 类似的上述器物外,还有碗托、擂钵、双角罐等(图七),后一类器物中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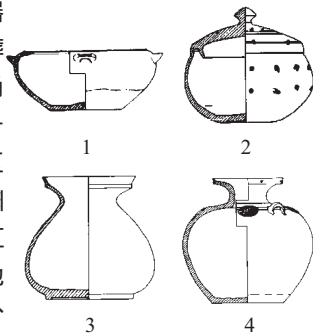
图七 吉水富滩墓出土瓷器

些与长江中下游的器物似是而非,如吉水富滩墓的唾壶,盘口深直,腹部垂鼓,南昌绳金塔墓鸡(鸟)首壶常见于长江下游,但是肩部以上的点彩却是长江下游地区所未见的,南昌火车站 M5 中肩部带团花的盘口壶、装饰点彩的带盖钵、M4 中系与口沿相平的四系罐都很有特点(图八),南昌梅湖墓的青瓷钵形态是典型的下游特征,但全身脱釉,这种现象不见于长江下游地区。这个时期江西地区的瓷器还表现

出明显的南北差异,在北部沿江地区,瓷器面貌与长江下游地区和中游的鄂城十分相似,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瑞昌码头墓,瓷器种类很多,不少是长江下游地区和鄂城地区的典型器,如盘口壶、蛙形水注、高圈足唾壶、双耳薰炉,还出土了只见于长江下游地区的谷仓罐(图九),这是这种器物分布的最西地点,不仅如此,甚至陶器如双系陶罐的形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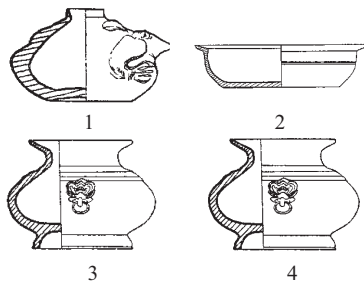
都受到瓷器的影响,可以看出与长江下游地区的关系。当然,与随葬瓷器

性质一致的还有墓葬形制,那种前后室甬道与后室侧壁连为一线的墓葬在江西地区东汉时期也找不到渊源。尽管如此,与长江下游和中游的鄂城地区面貌雷同的墓葬分布的地域仅限于沿江一线而已,数量也非常有限,绝大部分的江西地区和绝对多数这个时期的墓葬都带有明显的地域特色。与第一期相比,外来影响,主要是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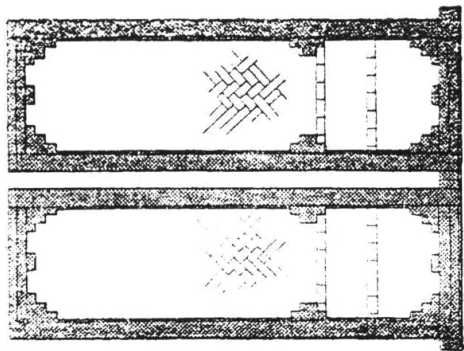
图八 南昌火车站 M4、M5 出土器物

1. M4 2~4. M5

图九 瑞昌马头墓和瑞昌朱湖墓出土器物
1~5. 马头墓 6、7. 朱湖墓

江下游和中游鄂城地区的影响明显地加重了,这种影响并不是表现为纯粹的外来形式,而是与本地特色较好地结合,创造出一批独具特色的瓷器,可以说是江西地区悠久的陶瓷工艺与外来新工艺良好结合的范例。

第三期即东晋中后期墓葬包括南昌永外正街 M1、新干金鸡岭 M4、M12、M34、清江洋湖 M4、M9、南昌市郊京 M1、南昌老福山 M2 等,墓葬数量不算多。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江西地区六朝墓葬中面貌最为单纯的阶段,墓葬形制和随葬品都相当简化。墓葬形制方面,早些时候带耳室的前后室墓和吕字形双室墓都消失了,带砖柱的长方形墓、凸字形墓继续存在,这种作为江西地区传统特色的墓葬的继续存在,与受到外来影响的带耳室墓葬的消失,说明江西传统特色在本地的持久力。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期发现了并列的双墓,如南昌京 M1(图一〇),两座长方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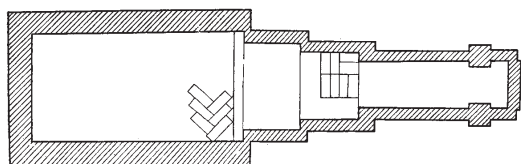


图一〇 南昌京 M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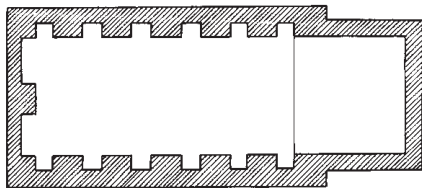
双室墓的前壁连接为一堵封门墙,墓室内由前至后分为依次升高的三级,可以说是这个时期的新事物。从这座墓葬中出土的玉器看,该墓的主人实行了朝服葬,墓主应是朝廷的命官。墓葬形制和墓主身份的关系值得以后继续关注。随葬品方面的变化同样显著,瓷器通常只有鸡首壶、罐、唾壶、盘、碗等寥寥数种,装饰纹样也很朴素,一般为素面,偶尔用点彩装饰。与前两个时期相比,本时期瓷器的质量有所下降,釉色、胎釉的结合状况都存在不少问题,这种状况与相关的窑址中的发掘状况一致。

第四期即南朝时期的墓葬发现较多,分布的地点也较为集中,南昌至吉安一线包括南昌张家山、南昌市郊京山、清江经楼、山前、洋湖、潭埠、新干金鸡岭、永丰蟠龙山、泰和上田码头墓等,赣江下游西侧地区包括靖安虎山、上高潘家村、高安梳头山墓等;赣南地区包括赣县上高村、白鹭、安远老围村、宁都塘泥排、南康横寨、大余宝珠山、兴国永丰公社、大余二塘墓等;江西北部地区有永修红旗生产队墓葬;江西东部地区只公布了余干长冈山发现的 1 座墓葬。赣南地区南朝墓葬发现地点的增多是前所未有的现象,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江西地区吴晋以来的墓葬分布格局。墓葬形制继承东晋中晚期的特点,主要为凸

字形和长方形墓,在墓室的角部或前后室的分割部位设置砖柱。那种很有特色的多级甬道的凸字形墓继续发现,如赣县南齐墓 M4(图一一,1),与靖安虎山墓一脉相承。也有个别墓葬的形制表现出新的特征,如南康横寨南朝墓 M3(图一一,2),凸字形墓室



1



2

图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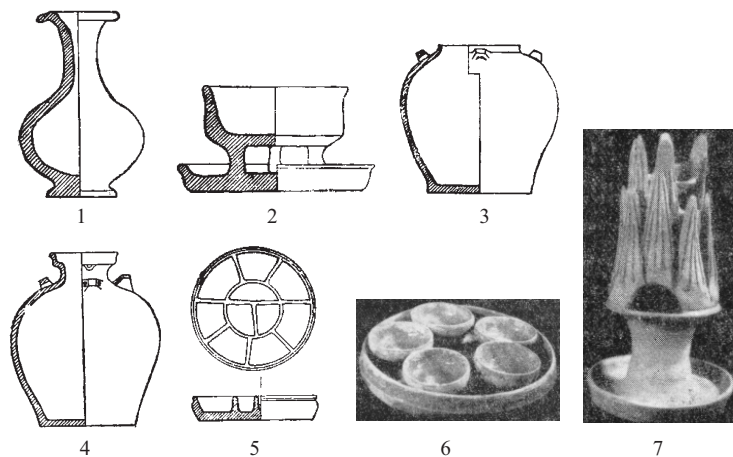
1. 赣县南齐墓 M4 2. 南康横寨南朝墓 M3

的两壁各列出五垛砖柱,与通常只在关键位置设置少量砖柱的常见做法不同。随葬品面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形成了江西地区特色的器物形态和组合,而且早些时期江西北部地区别树一帜的情况也不复存在。在器物组合方面,盘口壶、四系罐、长颈瓶、五虫盘、果盘、浅腹盘、三足炉、博山炉、灶、砚、碗是最基本的随葬器类,器物特征方面,盘口壶的短颈、盘口壶和四系罐外撇的下腹、灶台旁的司灶侍女、博山炉上部的莲峰人物都十分别致,几乎不见于其他地区(图一二)。这些器物的胎釉结合状况一般都相当不错,釉色多清亮喜人,与经常使用的莲花纹一道,创造出良好的艺术效果。

三. 与周边地区六朝墓葬的简单对比

上文按照不同的发展阶段,对每个时期江西地区六朝墓葬的形制、随葬品特征进行了简要的叙述,揭示了江西地区不同阶段和江西地区内部不同小地域之间的差异,为了更好地理解认识江西地区六朝墓葬的特征,我们有必要将江西地区的六朝墓葬放在中国南方地区六朝墓葬的总体背景之后进行认识,将其与周边地区的六朝墓葬材料进行对比,才能较好地把握江西地区的特点作出恰当的把握。

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可以用以与江西地区进行对比的地区有长江下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福建地区、两广地区,这些地区既与江西地区有一定的相



图一二 清江山前南朝墓出土器物

1. M9 2. MI3 3、4、6. M6 5. 吴城 MI 7. MI6

似之处,也有很大的不同,下面逐一简述如下。

长江下游地区 这个地区的六朝墓葬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在墓葬形制方面,东吴中期至西晋墓葬形式多样,前后室的双室墓和凸字形的单室墓最常见,券顶是最常见的墓顶形式,规模较大的墓葬多采用四隅券进式顶,多在墓室四壁设灯台,基本无棺床、小龕之类的设置。东晋至刘宋中期几乎为清一色的单室墓,券顶成为主流,多有小龕、直棂窗、棺床之类的设置,基本不见灯台。刘宋晚期至陈仍以券顶单室墓为主,多小龕、直棂窗、棺台之类的设置,但小龕多由凸字或长方形变为桃形,棺床之上或有石棺台,石台、墓门也或以石板制成。这个时期还流行莲花纹为主的花纹砖,还用多块花纹砖拼嵌成大幅人物、动植物壁画。其中第二阶段的前后还有一些差异,前一时期尚保留第一期流行的四隅券进式顶,棺床也不甚流行;后一时期墓葬形制明显多样化,棺床比较普遍,挡土墙、画像砖都是新生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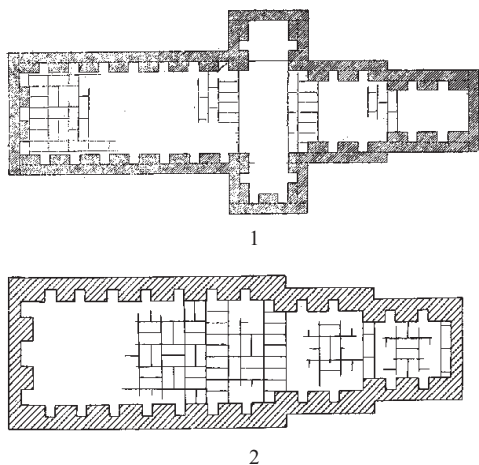
随葬品方面 陶瓷器始终是主要的随葬品,其中罐、盘口壶、鸡首壶、碗、唾壶、多子盒、虎子、薰、砚台是各个时期基本都具备的器物。东吴中期至东晋早期组的常见器物还有青瓷狮形水注、蛙形水盂、洗、鏹斗、犀牛形镇墓兽,陶或瓷质的五联罐、魂瓶、仓、井、灶、猪、羊、鸡圈等厨厕牲畜明器。还流行青瓷男女对俑。瓷器的总体造型比较矮胖,多模印网格纹、水波纹、联珠纹、铺首、仙人骑瑞兽图案。这个阶段瓷器种类繁多,装饰发达,胎釉结合紧密,是六朝瓷器面貌最丰富多彩的时期。东晋早期至刘宋中期的常见陶瓷器还有陶凭几、耳杯,陶或瓷质的盘、杯、盘、甗等。陶瓷器的种类较前期大为减少。瓷器造型

趋高,装饰简单,通常只有几道弦纹和一些点彩。瓷俑绝迹,陶俑早期流行胡俑,晚期以汉俑为主。这个时期的瓷器面貌与早些时候相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质量也有不如。来自于中原北方传统的陶器改变了随葬品的基本组合,并且在中高级墓葬中特别盛行,成为身份标志物。刘宋中期之后常见的陶瓷器还有瓷托盘、鼎盘、陶小鼎、凭几、牛车、仓屋、灶、井、犀牛状镇墓兽等。陶俑明显瘦长,女俑多着半月形覆额,男俑多着小冠。大多数瓷器形体修长。莲花纹是这个时期瓷器的主要装饰。

长江中游地区 主要是两湖地区,墓葬形制的发展步伐与随葬品的演变不完全一致。墓葬形制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东吴至东晋早期多室墓和双室墓盛行,券顶、四面积顶的穹窿顶、四隅券进顶并存。多有砖台,棺床不常见。东晋中后期多室墓基本消失,有少量的双室墓葬和平面近方形的单室墓。棺床已较为流行。南朝时期为清一色的单室墓,带砖柱墓比较多。砖台、棺床较常见,还有直棂窗。

随葬品的演变有四个阶段。基本器类同长江下游。此外,东吴早期有不少陶器,如灰陶罐、井、灶等。器物组合不详。东吴中期至东晋早期中瓷器占大多数,瓷坞堡、房屋、俑、动物、牛车等较为常见。反映世家大族状况的坞壁堡垒和反映早期佛教流传状况的白毫象俑很有特色。器物组合除碗、盘、罐外,其他不详。东晋中期至刘宋早期,与第一、二组相比种类大大减少,俑类很少。大致存在以凭几为中心,包括鸡首壶、唾壶、碗等的器物组合。刘宋中期以后陶器又卷土重来,如碗、盘、甗、灯、唾壶、凭几、榻等,还有相当数量的陶俑、陶屋。瓷器多用莲花纹装饰。以莲花、忍冬纹、人物纹为主题的画像砖相当发达。

福建地区 主要是沿海地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墓葬形制方面,西晋东晋前期有双室墓,刀形墓数量不多。东晋后期刘宋,双室墓消失。出现棺床,棺床之前的条砖之上用木板搭建成台子。南朝中后期,新出现带砖柱的双室墓,刀形墓最为流行,最富特色的是多级甬道的多砖柱墓,这种墓葬有些还在墓室前部做出两个耳室。棺床普遍流行,器物直接放置在棺材前。前两个阶段的墓葬形制比较简单,规模也不大,第三个阶段的墓葬形制明显与之前有所不同,特



图一三

1. 建瓯木墩梁墓 2. 政和 M834

别是多级甬道的多砖柱墓多集中在福建西北部地区(图一三),从随葬品的相似情况来看,福建地区西北部显然是江西地区直接影响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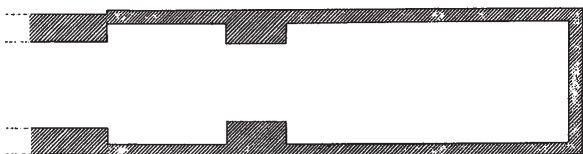
随葬品方面,罐、盘口壶、鸡首壶、碗是最基本的组合。西晋东晋早期器物还有圆形虎子、托盘、盖钵、狗圈等。器物组合不明确。东晋中后期刘宋早期的器物还有圆形虎子、砚台等。器物组合也不明确。南朝中后期的器物还有鼎盘、五盅盘、托盘等。碗、盘、单耳杯盘、鼎盘、盘口壶大致构成器物组合。南朝中后期的器物还有博山炉、簠斗、四孔插器、烛台、虎子、托盏等。碗、盘、五盅盘、博山炉、插器、烛台构成大致的器物组合。这个阶段的随葬品形制明显受到江西地区的影响,特别是福建西北部地区与江西地区的关系相当明显。

两广地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墓葬形制方面,东吴—东晋中期,以长方形和凸字形墓为主,也有少量的双室墓,有些墓葬已经出现以简单砖柱间隔墓室的做法。东晋刘宋时期,双室墓仍然有所保留,长方形和凸字形墓仍然为主流,发达的砖柱是这个时期的显著特征,有些较大型的墓壁已经出现直棂窗的做法。南朝中后期,双室墓仍未绝迹,砖柱仍时有可见,但已经不如第二组中那样严密规整,假棂窗的设置较为普遍,一些小墓中也出现了假棂窗。

随葬品方面,罐、碗、唾壶、盘是最常见的器物。此外,东吴—西晋中期具特征的器物还有硬陶罐、夹沙陶釜等,看不出明显的器物组合。西晋晚期至东晋中期具特征的器物还有耳杯盘、果桶、带盖孟、大口斜直壁的碗、牛车、仪仗俑、仓、犁田模型等。罐、盘、碗、唾壶构成基本的器物组合。东晋晚期至刘宋颇具

特征的器物还有果桶、鼎盘。罐、碗、鸡首壶构成基本的器物组合。齐梁时期,罐、碗、盘构成基本的器物组合,某些墓葬中还会增加鸡首壶、砚台、唾壶等物品。

赣江流域周边地区的墓葬情况已如上述。可以看出,江西地区的六朝墓葬的每个发展阶段,既有本地特色,也与周边地区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笼统说来,在墓葬形制方面,砖柱墓是江西地区东汉时期已经存在的极具地方特色的墓葬类型,可以追溯到清江武陵、南昌青云谱、宜春梁溪等地的东汉墓群,这种墓葬建筑形式贯穿于六朝的始终而又有所变化,六朝早些时候多在墓室四角或前后室的分割部位用单砖简单地竖砌,东晋南朝时期出现了多砖叠砌的方式。六朝早期砖柱墓就从江西地区有规模地传播到长江中游地区和两广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也有零星的发现,如马鞍山桃花冲 M2、扬州胥浦 M89、南京黄家营 M5 等(图一四)。南朝时期,砖柱墓的主要输出方向为福建地区特别是福建西北部地区,



图一四 马鞍山桃花冲 M2

湘中南地区一些墓葬出现的砖柱可能也与江西地区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如资兴南朝墓 M413、474、耒阳城关 M176 等。江西地区也接受周边地区的墓葬形制,如东吴早期的高荣墓直接来源于长江中游地区,南朝时期具有密集砖柱的墓葬应是从岭南地区传入。

随葬品方面,江西地区六朝墓葬第一阶段的陶瓷器中部分器物来源于东汉,如卵形罐、四系扁罐、带角罐以及仓、井、灶等,均可以见于清江武陵、樟树薛家渡遗迹南昌、宜春等地的东汉墓,只有少部分器物为新出的类型。总体说来,这个阶段基本不见外来影响。第二阶段陶瓷器的面貌发生较大的变化,陶器和酱釉器几乎消失,青瓷器受到长江下游地区的强烈影响,但地方特色仍有保留,如南昌、吉水等地墓葬中的部分瓷器明显是本地的产品。第三阶段瓷器面貌与长江下游相似,但质量不及,与今鄂州、武汉等地相比则较大的区别,可能是本地窑场的产品。第四阶段瓷器摆脱了长江下游的影响,四系罐、矮颈盘口壶、盘、瓶、灶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下腹外撇的罐子应受两广地区的影响,但有自身的发展途径。具福建沿海地区特色的器物偶尔可见。进

入江西地区的外来陶瓷产品的数量远不足以与江西地区对外的影响可比,这个时期是江西地区对外影响大增的时期。

四. 江西地区历史地位的变迁与成因

将江西地区六朝墓葬置于南方六朝墓葬的大背景之下,并与周边地区进行比较,我们对江西地区六朝墓葬的特性和重要性获得了比较客观扎实的认识,现在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从文化交流史的角度对江西地区所拥有的历史地位与成因略加分析。

六朝时期,长江下游地区凭借政治、文化上的优势,在六朝文化的形成、发展和交流过程中占据了明确的主导地位,这点毋庸置疑。根据历史研究的成果可知,荆州所在的长江中游地区在六朝时期的历史地位仅次于都城建康所在的长江下游地区,长江中游的考古成果在理论上讲,也应该与其历史地位相匹配,但是经过上文简略的区域考古材料的对比研究,我们发现,长江中游地区六朝墓葬文化的活力似不及江西地区,与其他地域之间的联系和互动更有所不及,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说,赣中南地区在区域交流中的重要性,仅次于长江下游地区,而高于长江中游地区,这是六朝时期的新现象,值得进一步的发掘。

从地理位置来说,在南中国的地理范围中,江西地区可以说居于天下之中的位置。优越的地理位置,使江西地区无形之中承当了文化枢纽的角色,在接受其他地区主要是长江下游地区文化的同时,向福建和两广地区不断输出自身的文化,随着历史的推进,向外输出的力度还在不断加强。具体说来,在东方,主要通过今武夷山的关口,江西地区特别是赣东南地区向福建地区输出自己的墓葬文化,并在南朝中后期将闽西北地区纳入同一区域。在南方,通过赣江通道,赣中南对两广地区发生很大的影响,东晋中期至刘宋在两广流行的砖柱墓就应是这个影响的产物。南朝时期,两广地区器物下腹外撇的造型风格又给赣中南地区一定的影响,上文所提及的多砖柱墓的南康横寨 M3,也是两广地区反馈江西地区的例证。在西方,主要通过武功山两侧的谷地,赣中南与湘中南联系不断,从东吴到南朝不曾断绝,例如,东吴后期至东晋早期,吉水、清江、南昌等地墓葬中的高圈足钵、擂钵、牲寮或仓房与耒阳、资兴、衡阳、郴州等地墓葬中的出土物十分相似^①。牲寮或仓房最能说明彼此的联系,赣中南那种独具特色的瓷仓应由湘中南的牲寮或仓房演化而来。在北方,通过水路和陆路,赣中南与两湖和长江下游频繁沟通。过北方通路,赣中南特色的砖柱墓有规模地在武昌地区出现

了,最远可达汉水北侧的今河南邓县一带,而长江下游南朝墓葬中出现的一些砖柱墓又是长江中游影响的结果,由此可见江西地区在六朝墓葬形制演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应该看到的是,在六朝区域文化的交流发展过程中,江西地区在各个不同时期所承受的作用并不完全一样,存在着某种阶段性。东吴中期至东晋,以接受外来影响为主,主要是北方的长江下游和西方的湘中南一带。以往注意了长江下游地区的影响,而对湘中南地区有所忽视,考古材料在此证史补史的作用非常明显。东晋中期已开始有规模地向外输出影响,主要表现在两广地区砖柱墓的成批出现。这说明,东吴西晋时期两广地区的墓葬面貌所受到的外来影响不宜过高估计,这与永嘉之乱以后,北方人口经由江西地区逐步推进到两广地区有性质上的不同。南朝时期江西地区较少接受外来影响,而以输出为主,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均可见明显的痕迹。在区域文化交流过程中,江西地区的地位稳步上升。

为了更好地说明江西地区历史地位的上升,不妨对湘中南地区的六朝墓葬略加考察。东汉时期,湘中南地区的地位相当重要,这里是中原核心地区经由长江中游与两广地区连接的主要通道,这一带发现的许多东汉墓葬证明了两广与长江中游和中原地区的联系。但是,大约从东汉晚期开始,湘中南一带的墓葬规模和随葬品数量急剧衰落下来。东吴中期以后,今湖南北部、湖北、赣中南普遍接受了长江下游的瓷器,湘中南具有东汉风格的陶器仍有相当的数量,瓷器的面貌显示了长江下游的影响,但装饰纹样有很强的地方特点,这种瓷器只能在本地产,这说明湘中南地区已经脱离六朝墓葬文化演变的主流圈之外。东晋中期,湘中南的瓷器面貌与今湖北和湖南北部较为相似,次一级地理中心的辐射效应代替了以往的枢纽地位。南朝时期,湘中南地方特点的瓷器不见了,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两湖墓葬区终于真正形成,也使湘中南地区彻底沦为两湖地区的边缘地带。湘中南除了东吴中期和西晋时期对赣中南,南朝时期对广西地区发生一些影响外,其余时间都在缓慢地接受着主要来自于湖南北部的影响。在区域文化交流中,六朝时期的江西地区取得了东汉时期湘中南地区的地位。

我们认为,赣中南与湘中南地位的此消彼长有着历史的必然。六朝时期,南中国的社会格局已与东汉大不相同。都城移到了长江下游入海口附近,以三吴为中心的扬州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已居于南中国的首位,交广的中心由苍梧移到南海。荆州仍然居于

重要的位置,但主要是军事方面的,所以荆州的北部最受重视,墓葬面貌与长江下游最为接近。对于建康而言,湘中南已相当偏远。建康与地方的主要联系,向西可假道长江,向南东面可假道海上,中间可假道赣江,西面的湘江通道已不十分重要。赣中南的重要性肯定会与时俱增,这一带的社会发展水平会越来越高,发展水平的提高反过来又会提高其在区域交流中的地位。

赣中南与湘中南地位的此消彼长的过程性还可以得到历史记载方面的证明。东吴立国毕竟不久,西晋又是一统天下,国家的中心仍在中原,所以东吴至东晋早期湘中南的地位还是高于赣中南的,一些重大的政治和军事行动主要取道湘江。东吴末年,交趾投靠西晋,建衡二年(270年),孙皓“遣监军虞震,威南将军薛珣、苍梧太守陶璜由荆州,监军李勣、督军徐存从建安海道,皆就合浦击交趾。”^⑫平吴之后,杜预在今天的江汉平原上开凿南抵岳阳的运河,目的是“内泻长江之险,外通零桂之漕”^⑬。东晋初年,为制约王敦,东晋政权诏令谯王司马承为监湘州诸军事、南中郎将、湘州刺史。晋元帝对谯王承说:“湘州南楚险固,在上流之要,控三州之会,是用武之国也。”^⑭但就是从东晋初年起,今江西地区的重要性已被逐渐认识到,已有“江州,国之南藩,要害之地”的评价,且“是时朝廷空罄,百官无禄,惟资江州运漕”^⑮。东晋宁康三年(373年),道安分张徒众,“(慧)远于是与弟子数十人,南适荆州,住上明寺。后欲往罗浮山,及届浔阳,见庐山峰清静,足以息心,始住龙泉精舍。”^⑯慧远在若干年前,曾有过与慧远相同的经历^⑰。二位高僧选择的路线是奇怪的,为赴交州,却不走与江陵邻近的湘江通道,反而下到浔阳,准备沿赣江而上。东晋中期,湘中南与赣中南的地位发生了逆转。东晋末期,徐道覆、卢循利用赣江进攻荆扬二州^⑱,是人所熟知的。南朝关于赣中南的记载继续增多,所记内容与以往有三点不同。1.地点更加具体,如《南齐书》卷四十八《刘绘传》有“南康是三郡喉舌”的议论。2.有人在这个地区利用宗教进行反政府活动,《梁书》卷三《武帝纪下》载,大同八年,“安成郡民刘敬躬(或作‘宫’)挟左道以反。”3.梁陈时有专指这个地区的“南中”一词。《梁书》卷三十四《张缵传》在叙述刘敬躬(宫)聚众为乱安成、南康、庐陵、豫章时说,“南中久不习兵革,吏民恒抗奔散。”《陈书》卷一《高祖纪上》载,绍泰二年七月,“是月侯瑱以江州入附。遣侯安都镇上流,定南中诸郡。”南朝时期赣中南的地位比东晋又有上升。此时

的湘中南,并不是寂尔无闻,宋初颜延之赴始安太守任,“道经汨潭。”^⑲梁末年,“时湘衡之界五十余洞不宾。”^⑳湘衡之界大约在今湘桂粤三省交界的九嶷山南北。这个地带酋豪洞主的不宾,表明湘中南的开发到了一定的深度,但与赣中南却不可同日而语,湘中南地区在南朝政治史中几乎没有发挥出明显的作用,便是良好的说明。

五、小 结

江西地区的六朝墓葬已经公布近200座,满足了进行综合研究的基本要求。这个地区的六朝墓葬可分为四个时期:汉末东吴早期、东吴后期—东晋早期、东晋中后期、南朝。每一时期的墓葬面貌的形成既有江西地区的传统因素,也受到其他地区特别是当时政治中心所在的长江下游地区的推动。在六朝时期的几个主要地理和墓葬文化区域中,江西地区的地位低于长江下游,而略高于政治地位十分重要的长江中游地区。江西地区这一地位的形成,与六朝历史的演变和政治格局的重新构造具有紧密的联系,值得继续关注和探讨。

注释:

依笔者统计,全国已正式发掘公布材料的六朝墓葬总数约2200座。

墓葬时代一般不具体到某个朝代,部分墓葬的时代已在重新研究后予以调整,不一一说明。

该墓原简报断代为西晋,迄今发掘的西晋墓葬中没有发现类似该墓出土的瓷壶和瓷簋,这种形态的瓷壶和瓷簋常见东汉晚期,考虑到东汉晚期多是陶器,因此怀疑墓葬的时代要晚些,所以将墓葬的时代推定在汉末吴早,这在江西地区墓葬中是罕见的墓例,所以特作说明。

2001年夏,笔者曾在江西省考古研究所李荣华先生的陪同下,前往玉山县和上饶市博物馆参观,两地都有南朝文物,可知当地均有南朝墓发现,但资料没有公布,类似的情况在别处(和其他省份)也存在,由此可知统计六朝墓葬的数量和研究墓葬的地域分布状况时,应当谨慎。

a. 黄颐寿:《清江武陵东汉墓》,《考古》1976年第5期。b. 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青云谱汉墓》,《考古》1960年第10期。c. 曾和生:《江西宜春东汉墓清理简报》,《南方文物》1993年第3期。

a. 马鞍山市文物管理所、马鞍山市博物馆《安徽马鞍山桃花冲三座晋墓清理简报》,《文物》1993年第11期;b. 胥浦六朝墓发掘队《扬州胥浦六

朝墓》，《考古学报》1988年第2期；c. 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宁县黄家营第五号六朝墓清理简报》，《文物》1956年第1期。

a.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资兴晋南朝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3期；b. 衡阳市文物工作队《湖南耒阳城关六朝唐宋墓》，《考古学报》1996年第2期。

a. 黄颐寿：《清江武陵东汉墓》，《考古》1976年第5期。b.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樟树薛家渡东汉墓》，《南方文物》1998年第3期。c. 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的汉墓与六朝墓葬》，《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d. 曾和生：《江西宜春东汉墓清理简报》，《南方文物》1993年第3期。

可参见《江西历史文物》1983年第3期封二、图4 供台（应为插器）。江西省博物馆考古队：《江西南昌市郊南朝墓发掘简报》图版捌、14，《考古》1962年第4期。

姚公骥先生有明确的论述，“在古代，赣江水运之利对于江西经济文化的开发和发展关系至巨。中国东半壁赖以沟通江湖陆海，纵贯南北者仅此一途，从而形成江西区域经济文化上的重要特点。”见许怀林《江西史稿》序，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

（上接第113页）

形制》，南阳汉代画像石学术讨论会办公室编《汉代画像石研究》第53~61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③⑤ 徐州博物馆：《江苏铜山县凤凰山西汉墓》，《考古》2004年第5期。

③⑥ 徐州市博物馆、沛县文化馆：《江苏沛县栖山汉画像石墓清理简报》，《考古学集刊》（第二集）第106~112页。

③⑦ 资料暂未发表。

③⑧ 徐州博物馆、新沂县图书馆：《江苏新沂瓦窑汉画像石墓》，《考古》1985年第1期。

③⑨ 南京博物院、邳县文化馆：《江苏邳县白山故子两座东汉画像石墓》，《文物》1986年第5期。

④⑩ 徐州博物馆：《徐州绣球山西汉墓清理简报》，《东南文化》1992年第3、4期合刊。

④⑫ 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九里山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第12期。

④⑬ 原丰、耿建军：《徐州翠屏山发现西汉刘治墓》，《中国文物报》2004年2月6日第1版。

④⑪ a. 李希朗：《江西吉水富滩东吴墓》，《南方文物》1996年第3期。b. 江西省博物馆考古队：《江西清江晋墓》，《考古》1962年第4期。c.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昌市发现三座晋墓》，《考古》1986年第9期。d. 衡阳市文物工作队：《湖南耒阳城关六朝唐宋墓》，《考古学报》1996年第2期。e.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资兴晋南朝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3期。f. 衡阳市博物馆：《湖南衡阳茶山坳东汉至南朝墓的发掘》，《考古》1986年第12期。g.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郴州市郊东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82年第3期。郴州市郊烟厂东汉墓的时代可能晚至西晋。

④⑫ 《三国志》卷四十八《吴书·三嗣主·孙皓传》。

④⑬ 《晋书》卷三十四《杜预传》。

④⑭ 《晋书》卷三十七《谯王逊附子承传》。

④⑮ 《晋书》卷八十一《刘胤传》。

④⑯、④⑰ 梁·慧皎《高僧传》卷六《义解·晋庐山释慧远传》。

④⑱ 《晋书》卷一百《卢循传》。

④⑲ 《宋书》卷七十三《颜延之传》。

④⑳ 《陈书》卷九《欧阳颢传》。

④④ 江山秀：《江苏省铜山县江山西汉墓清理简报》，《文物资料丛刊》（1）第105~110页，文物出版社1977年12月1版。

④⑤ 南京博物院：《徐州青山泉白集东汉画像石墓》，《考古》1981年第2期。

④⑥ 刘尊志、赵海洲：《试析徐州地区汉代墓葬的车马陪葬》，《江汉考古》2005年第3期。

④⑦ 《春秋繁露·奉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④⑧ 《春秋繁露·观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④⑨ 笔者主持发掘，资料暂未发表。

④⑩ 耿建军、马永强：《徐州市苏山头汉墓群》，《中国考古学年鉴》，第174~175页，2003年。

④⑪ 《春秋繁露·阴阳尊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④⑫ 《春秋繁露·顺命》，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④⑬ 韩国河：《论秦汉魏晋时期的家族墓地制度》，《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2期。

④⑭ 《白虎通义·崩薨》，中华书局，1994年。

④⑮ 吴桂兵：《西汉中后期的夫妇同穴合葬》，《四川文物》1998年第1期。



本期导读

一.《鄢县乔家院春秋墓初识》

冯峰《鄢县乔家院春秋墓初识》是对湖北鄢县发现的四座东周墓葬的个案研究,对墓葬的国别、族属、等级、年代等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作者从器物的形态、文字和特殊器形的分析入手,提出了与前人研究不同的观点,有一定的创新性。本文论据充分、论点稳妥,图文并茂,是一篇有意义的学术论文。

二.《徐州汉代夫妻合葬墓初论》

刘尊志《徐州汉代夫妻合葬墓初论》是对汉代特殊丧葬习俗——夫妻合葬的个案研究,以徐州为中心,在选题上具有典型意义。在研究方法上以考古类型学为基础进行了合葬墓的形态分析,进一步讨论了相关的等级制度,并从社会伦理、礼仪制度等角度进行了具体的解释。提出了这一特殊葬俗的发展估计及在汉代的具体表现及成因。文章证据充分、论点中肯,也有创新,是一篇有价值的考古学研究论文。

三.《江西六朝墓葬综述》

韦正《江西六朝墓葬综述》对考古发现的180余座江西六朝墓葬进行了资料的梳理,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分期,并与周边地区的长江下游和中上游六朝墓葬进行了比较,结合历史背景分析了江西六朝墓葬的特殊性,分析江西独特的墓葬文化形成的原因。

本文在选题上弥补了以往对江西六朝墓葬研究的不足,对资料的整理也比较全面客观,尽管在分析墓葬的文化内涵上有待进一步深入,但仍不失为一篇有价值的论文。

四.《江西地区宋代墓葬的分期研究》

吴敬《江西地区宋代墓葬的分期研究》是一篇区域性墓葬研究论文,对材料丰富但以往关注较少的江西宋墓材料进行了资料整理,主要采用传统的考古类型学方法对墓葬形制和随葬品进行了分析和分期,并试图从社会史、经济史的角度对江西宋代墓葬文化进行分析。本文对材料的收集较为全面、适用方法稳妥,虽然对与墓葬密切相关的社会和经济变革缺乏更深入的探讨、对墓葬的精神内涵也少有涉及,但仍不失为一篇有意义的基础研究论文。

(李梅田)